



西南边疆民族文库·西南边疆史丛书
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明代 云南政区治所 研究

陈庆江 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新疆民族文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历史研究所

明代 云南政区治所 研究

陈庆江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陈庆江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6

(西南边疆史丛书)

ISBN 7-105-05096-9

I. 明… II. 陈… III. 政区-研究-云南省-明代

IV. K9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393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40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 册 定价: 22.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经济室电话: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西南边疆民族文库》

学术顾问：

王钟翰 宋蜀华 马 曜 尤 中 李 埏 张文勋

出版编辑委员会：

主 任：方 铁

副主任：林文勋 李 杰 和少英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大正 邓启耀 方 铁 李绍明 李 杰

陈庆江 杨德华 和少英 林文勋 贺圣达

《西南边疆史丛书》主编：王文光

序

朱惠荣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的发展十分突出，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城市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重视，有关成果大量涌现，然而对边疆城市的研究却很薄弱。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不同的民族又各具特色。城市的发展既具有时代特点，也具有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 and 不同地域的城市，往往以其独有的特色，区别于其他时代和地域。只有对东北、蒙古、西北、青藏、西南各边疆地区城市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并且对他们认真从历史地理的视角给予考察，才能揭示我国城市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边疆城市史的研究亟待加强。

西南边疆古代多山城。崇山布列，高低错落，各族先民多作山的文章，山寨比比皆是，由山寨演变而来的山城不少。如蒙自“上有故城，白夷所居，即今县治，下临巴甸”。景东“昔为蛮寨，洪武中建景东卫城于山上”。马笼部“因马笼山立寨”。易门县城原在“南庄之巅”。平夷县城原在旧城山上。元谋县城最初在马头山上。这类古城一般较小，多选择山河交汇险要处，或山顶有一块平缓的土地，但四面陡绝，易守难攻。它们也不同于内地的城堡，利用天然地形，稍作加工，即固若金汤。有的位于坝子边缘，居高临下，便于控制广阔的农业区，征敛粮赋，方便联

络。古代湿热的气候也影响着这种选择，低热坝子和河谷多瘴毒，选择冷凉的山上，居住条件较为优越。《元史·地理志》、《元混一方輿胜览》记载大量称“城”的地名，有的地名带“龙”、“笼”、“鲁”、“弄”，“蛮语谓湊为水，笼为城，因此为名”。这类城在大理时期较为普遍，多是当地民族据险而居的重要聚落，并不都是政区治所。它们适应落后的生产力，建城的经济投入较少，规模小，容量有限，有的甚至官府衙门都无法全部容纳，其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封建国家派来的官吏生活习惯与当地土官不同，经常为上坡下坎叫苦。渐渐地，古城往低平、开阔的坝子里搬迁，土城、石城、砖城的建筑越来越普遍，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比较突出。然而，西南边疆的古城仍离不开山，它们往往背后倚高山，前面有案山，城中有镇山，既培风水，又便防卫，还突出了立体景观效果。云南的古城很多选址在西山麓，背后的高山刚好挡往常年吹袭的西风，东边开阔的坝子又可招迎熙和的朝阳。南诏时似乎已经把风水的概念用于城址的选择，点苍山 19 峰“俨若负屨”，中和峰正对着阳苴咩城。拓俞城不但背倚太保山，正东远处的山顶恰巧有一峰状似卧佛朝天的头像。城中有镇山的治所也很普遍，如嵩明城中有黄龙山，呈贡城中有三台山，泸西城中有钟秀山。安宁城西倚太极山，城内西缘的百花山、鸡冠山与城外东缘的螳螂川互相呼应。宜良城中雉山、万寿山、小凉山如“品”字巧妙布列。这些成了高原上的又一胜景。

西南边疆古代也多水城。人的生活离不开水，古城近水不足为奇，但不少古城却与湖泊结缘，人们对高原湖泊有特殊的感情。各族先民着意做水的文章，昆明、昆阳、呈贡、澂江、江川、通海、河西、杨林、洱源、石屏、泸西、东川等原来都是湖边的水城。它们往往位于河湖交汇处，左右两边或一边濒临小河，城以河湖为限隔。背倚名山，或城中小山起伏，山水结合，高低错落，便于妆点，大大提高了古城的环境质量。附近有坝

子，土肥水饱，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昆明就是这类成功构筑的水边大城的典范。“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南诏德化碑》）。1200多年前创建拓东城时，阁罗凤已发现了它的优越条件。古人还善于利用湖中的洲、岛作城，洱海有舍利水城，抚仙湖有孤山，中涎泽有卤昌城。异龙湖中原有三岛，大水城、小水城为首长居住，最小的一个岛专门用作囚禁犯人。高原湖泊给西南边疆古城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在它们周围多形成富饶的鱼米之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增多，供给充足。有湖光山色之胜，气候调适，居住环境优越。湖泊既是天然壕堑，便于固守；又提供了水上交通的便利，成为联系外界的通途。当然，湖水涨溢，也会发生洪涝灾害，造成对古城的威胁。为了躲避水患，江川、澂江等城不得不迁离湖岸。经过千百年沧海桑田的巨变，嘉丽泽、中涎泽、矣邦池、曲靖交水海子、东川蔓海等因垦殖而消失，一座座古城告别了荷塘轻舟相伴的时代。滇池、洱海、茈碧湖、异龙湖、杞麓湖等水域皆有不同程度的收缩，湖岸线变迁，昆明、洱源、石屏、河西、通海等城离湖越来越远，终于失去了水城的风韵。也有一些古城位于河边，大河变化无常，比湖泊更难驾驭，选址河边的古城常受折腾。邓川州城、富民县城就是因为弥苴佉江、螳螂川水患多次搬迁的例证。或“圯于流潦”，“民舍尽没”，或为“山水冲没”，或“山崩沙溢，田庐尽没”。

西南边疆古代作为政区治所的古城数量常有变化。总体说，数量在逐步增加，但往往呈曲线起伏，并不都是越来越多。从汉晋到南北朝，随着行政区划越分越细，郡县城邑逐渐增多，分布也比较均衡。但有些是“有名无民曰空荒不立”（《南齐书·州郡志》），其规模不能与内地同日而语。唐代的羁縻州多分布在中原王朝加强控制的交通干道上，为了保证交通干道畅通，石门路、清溪关路、通海城路等交通沿线设治较密，州县间相距甚近。

“即其部落，列置州县”。“皆无城邑，椎髻皮服，惟来集于都督府，则衣冠如华人焉”（《新唐书·地理志》）。按照当时内地人的观点，羁縻州县的治所不具备城的标准形态。但仔细审视，这些正是唐代当地民族的山寨。南诏时称“城”的地名甚多，但性质有别。《新唐书·兵志》说：“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南诏仿唐制度，城的军事性质应该十分突出。但南诏的城很多都是政区治所，六节度、二都督驻地相当于府、州治，另一些城相当于县级。《蛮书》卷六说：“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长傍、摩零、金宝、弥城等五道事。”城的政区治所的性质也很明确。在交通沿线或边地的城，应是驻兵守卫的堡垒，如诸葛亮城、些乐城、保塞城、新安城、八平城。一些产盐的地方也置城，如傍弥潜城、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南诏城的分布，以十赕中心区及其以北、以西前朝设治较稀的区域最密，南部也有一些，以东有的赕、府、州、郡和大量部的治所却不见称城。元代州县规模偏小，在滇东和滇中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析置较多州县。经过明清的调整，逐步裁撤了一批州县治所，如为美、归厚、邵甸、杨林、通泉、石梁、亦佐、芳华、河纳、县市、弥沙、三泊、普舍、研和等，政区设置复归于均衡。明代又将一些州县治所移入府城内为附郭，也减少了城的数量。清初废除卫所制，又减少了一批古城。这些古城数量和局部地区密度的变化，主要决定于封建国家的统治政策和行政因素，我们应谨慎对待，不能随便据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尺度，假设用这些数量和密度来证明城市经济的发展或衰落，是含有很多水分的。

在我国历史上，古城的迁变是常例，西南边疆古城的频繁迁徙可能创了记录。引发的原因很多，只是有些城位置移动较小，有些城稳定时间较长，有些城则迁徙无常。第一，政治事件或战争引发古城搬迁，选择更有利于固守的地方筑城。如，明嘉靖年

间，寻甸土官和武定土官相继叛乱，平定后，寻甸府城和武定府城迁址。万历年间平定者继荣叛乱后，改罗雄州为罗平州，迁建州城。第二，政治形势变化，引起治所迁徙。洪武年间越州土官阿资叛，在越州与贵州普安间出没，所以置平夷卫于二者适中处的厄勒铺。以后擒斩阿资，“越州乃平”，弘治年间迁平夷卫于今富源县城，变为控驭滇黔交通要冲的重镇。第三，明代府卫治所整合，引起州县治所搬迁。起初往往府卫系统的治所分设，以图起到互相呼应的作作用，后来撤并，卫所驻地优越，府州多迁治与卫所合为一城。如易门县迁治易门守御千户所城。清代裁陆凉卫，陆凉州治迁到原卫城。第四，土官、土目不轨，引起迁治。洪武时，剑川州土官“意不轨，乃废旧治，即上登之广明寺为治，以便私事”。“未三载，复创治于下登罗鲁城，背山阻水，险僻湫隘，盖欲负固以起妄图。”富州城旧治普厅，“崇祯中，土目李保叛，逐土官，土官移居州东南境，地名归朝”。第五，水患引起多次搬迁。如崇祯五年（1632）、六年“江川大水，旧城淹没，七年迁城”。邓川州也因“水患频仍，迁徙靡定”。富民县属同样情况，因水患“复迁高阜处”，“寻以远汲不便”，迁回河边，在螳螂川两侧频繁迁徙。第六，地震毁城，引起古城迁并。汉代邛都城因地震陷为邛海，以后在附近另立新城，即今四川西昌城，事见李膺《益州记》。这是迁城的例子。明代北胜州城原在永胜县北的高家村，正德六年（1511）大地震夷为平地，北胜州治即迁入澜沧卫城。这是并城的例子。第七，迁址以求扩大发展。随着人口增加，要求扩建城垣、官衙、街衢、寺庙、集市等，有些“基址逼隘”的城逐步迁到坝子里或开阔地，如景东、平夷。第八，从贫瘠的地方迁到富庶的地方。如云龙州治从旧州迁到以产盐著称又曾设盐课提举司的雒马井。第九，追求风水形胜迁址。如河西县从螺髻村迁今河西镇，是因“以普应山方隅形势为正”，前对凤凰山，后倚普应山。第十，经历寇盗、火灾等，

引起另择新址。如昆阳州在崇祯年间“旧治经寇，故卜筑新邑”，于是迁筑新城于今大新城。

其实，古城的选址是各种因素的综合比较，各种指标的科学搭配，各种利弊的反复权衡，甚至是对多年积累问题的深层探讨，意在寻觅古城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环境，上面所述城址搬迁的原因，往往只是引发作出决定的近因。西南边疆的古城，作为各级政区治所，优先考虑的条件是行政效益的发挥和安全保障。作为推行奴隶制统治或封建制统治的前哨，为了发挥行政效益，总要选择其统治区域的中心，占有区位优势。它们也必然处于风口浪尖，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反对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斗争交相烤炙。因此，行政中心一般也必须是军事堡垒，既便于积蓄力量，主动出击，又便于设防，应付不测，长期固守。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如影随形，相伴相存。交通条件也很重要，必须平时便于上情下达，应急则可以作出快速反应。一些重要统治中心对交通条件的选择极为严格，它们与交通干道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既要利用方便的通道为自己服务，又要与交通要冲间留出缓冲，防止敌对的军事力量长驱直入。古城大理南距下关 13 公里，以西洱河为限，下关虽当交通要冲，却被几个州县分治，长期得不到发展。石城原在今曲靖三岔，为滇东重镇，处交通要冲，元代曲靖路治南移 7 公里处寥廓山下，东有交水海子，北以白石江为限，便于层层设防。边疆古城的设置不一定要寻找文化中心区，然而，随着中央王朝官吏的到来，也带来了中原文化，各级政区治所逐步相应地设置孔庙、儒学、书院、义学等等文化教育机构，程度不同地扮演了文化中心的角色。土司区虽然汉文化薄弱，但却是民族文化传播的中心，今天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保留和传承，也得益于此。

古代各级行政中心的设置，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指标，但在

边疆往往难于贯彻。《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二》说：“黄草坝著名黔西，而居聚阡阡俱不及罗平州；罗平著名迤东，而居聚阡阡又不及广西府。此府、州、营、堡之异也。”普安“十二营以归顺为首，而钱赋之数则推黄草坝。”在明代，黄草坝集市赶马场，“人集颇盛”。“田塍中辟，道路四达，人民颇集，可建一县，而土司恐夺其权，州官恐分其利，故莫为举者。”经济条件与其他条件相衡，经济因素却被挤到次要的地位，让位于一些最现实的条件。但可喜的是，即使经过若干年，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经济因素。黄草坝就是一个例子，清嘉庆三年（1798）终设兴义县，1982年成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1987年设兴义市。又如云龙州向以产盐著称，但治所原在澜沧江以西的旧州，产盐区另设盐课提举司。由于盐业经济实力增强，提出了设州的要求，“先是，雒井名士以其地文风渐兴，学校未立，士游别庠，又提举司惟司盐政，民事不得预，非便，屡请改州建学。”万历中已经有人提出“弃旧州，徙于提举司治”的方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获得批准，裁提举司并于州，移州治于司治。但新上任的知州极力主张：“移治井司，是自弃险要以予逆也，不可”（光绪《云龙州志》）。直到崇祯二年（1629），迁治雒马井的方案才得实现。元谋县城的迁徙拖的时间更长。县治原在元谋坝子南缘的老城，处元马河南岸，北距长河，南临深箐，偏于一隅，地势逼窄，但气候稍凉，便于官吏生活。天启二年（1622）建砖城，虽设四门，但仅开南北两门，南门也常关闭。城中“蔡芥螫刺，充垣塞馗”，“居民寥寥”，“市无行人”（《华竹新编》）。北门外河对岸沙滩上有定期集市称河坝街，维持着少量的商业活动。马街处元谋坝子中部，昆明至会理、西昌的交通要道上，明代以来商业繁盛。清代，逢午而市，连赶两日，“滇南之大都会也”。檀萃描述乾隆年间的盛况说：“若夫马街，尤属通衢，四方云涌，百货鳞铺，萃人间之所有，均日用之所需，既无穷其多寡，亦难

论其精粗。”俗称“金马街，银元谋”，比喻马街较元谋县城还富庶。这种状况延续了几百年，直到清光绪四年（1878）县城迁到马街，行政中心终于屈就经济中心。弥渡的设治是农业开发带来的结果。明代称迷渡市，嘉靖初筑城，旧城“居庐甚盛”（《明史·地理志》），有巡检司，新城为景东卫贮粮之所。因水网密布，行人难渡，往往迷路，故名。由于对大片沼泽地的开发，人口、农业和商业都有一定规模，是明代西南边疆少有的几个称“市”的地名，由赵州、洱海卫、云南县、蒙化府分治，共同垦殖，景东卫也在坝子中设屯。清代大力治水、垦殖、建桥，取“水多易渡”之意，称弥渡市镇，驻通判，又是西南边疆少有的几个称“镇”的地名，可见其经济发展的程度。但直到1912年，才析赵州、云南、蒙化等县插花地置弥渡县。经济条件应该是古城选址的基础，在经济条件优越的地方建城才最有生命力，晋宁、安宁等少数几个城址不变的古城可以为证。晋宁古城位于古滇国富饶农业中心区，开发较早，为汉代滇池县和益州郡治所，“郡土大平敞”，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俗奢豪，难抚御”（《华阳国志·南中志》），其经济状况可想而知。安宁为汉晋时期的连然县治，西汉即设盐官，以产盐著称，南诏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盐池鞅掌，利及群欢，城邑绵延，势连戎梵”（《南诏德化碑》），取之不竭的盐矿一直开采至今，那是一座以盐业为支柱产业古城。还有拓东城——鸭赤城那样闻名于世的“壮丽的大城”，南诏、大理政权建都长达500年的阳苴咩城，都为大家所熟悉，此不赘述。两相对比，西南边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就显现出来，行政中心经济因素的比例相差很大，散在各地因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市镇又不一定是行政中心。它们的结合能够有力地推动城市的发展，但这个结合的途程多么曲折漫长，这个结合的实现多么艰辛！

西南边疆古城在发展中普遍加重了经济的砝码。随着农业

经济的发展，山寨逐步移进坝子，把过去鞭长莫及的农业区变为自己的舞台，扩大了古城的规模和内容，消费性支出与日俱增。明清时，这种城址的转移非常普遍，山寨摇身一变，成为代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各级中心城市。水城的蜕变也是受经济利益驱使。元代以来官府和富户采取各种手段降低水位，围湖造田，越往后步子越大。随着农业开发的深化，对湖边沼泽滩涂的零星蚕食逐渐增多，最后竟至将整个湖排干建成农场。很多湖泊缩小或消失，原来广阔的水域变成了富庶农业区，许多风光明媚的高原水城的景观消失殆尽。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时代，增加千万亩肥沃农田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飞跃，垦田数和人口数的大量增加都被记入史册。当时的执政者也许没有想到，进入人们向往生态城市的 21 世纪，生态环境恶化，让人们有可能重新审视历史，当初走过了头，将使后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以上所述，以西南边疆为例，足可看出古代城市研究的难度和复杂性。陈庆江同志知难而进，选择明代云南各级政区治所，从政区治所的逐个定位入手，系统地而不是零星地分析各个古城所处的地理环境、分布特征、景观、功能等，意在探讨城市发展的历史规律，为现今正涌动的城市建设热潮提供借鉴。庆江从我研学历史地理十多年，从学士、硕士而博士，在社会上浮燥风气弥漫的岁月，甘坐冷板凳，严守学术阵地，锲而不舍，严谨治学，深入钻研，步履坚实。我想，不但他的研究成果应该在我们的学术百花园里占有一席之地，他揭示的问题会引发人们的思考和兴趣，他追求的学术风气也会使大家为之振奋。庆江同志正当盛年，祝他一路走好，硕果迭出！

目 录

序/朱惠荣 / 1

绪论 / 1

一、明代：古代云南政区治所发展的重要时期 / 1

二、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的意义 / 3

壹 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的地域分布及地理特征 / 7

一、影响明代云南政区治所地域分布
的几大因素 / 7

二、明代云南政区治所地域分布的一般状况 /10

三、明代云南政区治所地域分布上
的几类特殊群体 / 32

四、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的地理特征 /36

贰 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的废衰与迁徙 /44

一、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的废衰 /44

二、明代云南府级政区治所的迁徙 /56

三、明代云南县级政区治所的迁徙 /73

四、明代云南政区治所迁徙的经验和教训 /99

叁 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的城池 /104

一、明代云南政区治所自然形态概述 /104

二、明代云南府级政区治所的城池 /106

三、明代云南县级政区治所的城池 /139

肆 明代云南政区治所功能探析 /181

一、政治功能居主导地位 /181

二、军事功能互有差异 /192

三、经济功能发展不平衡 /211

四、文化功能日益增长 /237

附录一：明代云南政区治所地理特征概要 /268

附录二：明代文献记载的部分云南

政区治所地名及其位置 /290

后记 / 296

绪 论

一、明代：古代云南政区治所 发展的重要时期

古代云南政区治所有着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独特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明代是极其重要的时期。

政区治所的发展历程与政区的置废分合完全联系在一起。以古代云南来说，这个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先秦时期。这一时期云南地区生活着许多部族。在各部族自身的奋斗中，在它们相互之间及其与巴、蜀等地区的交往联系中，在庄蹻王滇所开创的新格局下，它们在这片土地的山山水水之间迈动着前进的步伐。各部族前进的脚步声奏响了政区设置的前奏，各部族的活动区域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来政区分划的基础，可以说，它们的活动中心便是政区治所的萌芽。这些部族活动中心卓立于政区治所发展历史的起跑线上，预示了必将继之而来的起伏跌宕的续篇。（二）秦至唐前期。秦王朝建立后，云南地区便逐渐融进了封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大潮，政区及其治所发展的长轴自此渐次展开。秦修五尺道，自今四川宜宾一带达于今曲靖地区，且

“诸此国颇置吏焉”^①。汉武帝时几经努力，重“开西南夷”，在今云南地区设置了若干郡县。东汉及三国蜀时，在调整原设郡县的同时，将更多的区域纳入了郡县范围。进入两晋南北朝，实际上主要受控于爨氏的云南地区各郡县的发展基本上依凭区域内自身的因素，当然，其与内地各政权的各种联系并未斩断，且保持着统辖与被统辖的关系。隋初，爨氏“遣使朝贡”^②，接着有了一系列隋王朝抚慰、经营云南地区之举。唐廷在云南地区设置的政区虽为“羁縻”，但透过一次次腥热的烽火硝烟，其加强对这一地区行政管辖的目的昭然若揭。物换星移，政区代有增益损并，而这一背景之下便是政区治所的荣衰更替。（三）南诏、大理时期。还在渔阳鼙鼓“惊破霓裳羽衣曲”^③之前的一段时间，边疆民族政权的大旗就已在“彩云之南”竖起来了。由此，红土高原在变奏的节律中行进了几百年。这是云南地区的政区及其治所相对独立发展的一个时期。不过，独立却不封闭，且对相应时代的唐宋制度多有借鉴。（四）元至鸦片战争前。“元跨革囊”又一次改变了高原前行的轨迹，又一次将这一地区政区及其治所发展的合力重组。元王朝对前此时期政区、部族地域的分划网络作些剪裁，而后贴上自己的标签，将其纳入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大一统范式中。明、清王朝将大一统范式中的缕缕根须更加充分、深入地植入这个区域的片片土壤里。政区治所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演绎着它们的历史，带着文化冲突与消解、排拒与接纳、选择与淘汰的深深印迹，蹒跚地走出古代。

纵观古代云南的政区治所，元以前的大多数早已如“秦宫

①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② 《新唐书·南蛮传》。

③ 白居易：《长恨歌》。